

中华孔子学会 主办

中國儒學

中石題



第八輯

王中江 李存山 主编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中华孔子学会 主办

中國儒學

中石通

第八輯

王中江 李存山 主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儒学(第八辑)/王中江,李存山主编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5161-3857-1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②李… III. ①儒普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B22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3013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凌金良
责任校对 石春梅
责任印制 李 建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(邮编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-64070619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37.5
字 数 556千字
定 价 89.00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010-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学术委员会

主 任 汤一介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土田健次郎	任继愈	汤一介	安乐哲	成中英	刘述先
羊涤生	萧蓬父	余英时	杜维明	余敦康	狄百瑞
沟口雄三	李东俊	张立文	庞 朴	罗多弼	周桂钿
荒木见悟	郭齐家	顾 彬	钱 逊	崔大华	黄俊杰
蒙培元	葛荣晋				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王中江 李存山

副主编 千春松 唐文明 谢 庆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,带*者为执行委员)

万俊人*	千春松*	马渊昌也	小島毅	王中江*	刘笑敢
吴 光	李存山*	李明辉	李景林	李翔海	陈少明
杨国荣	张学智*	杜瑞乐	郑宗义	林月惠	费瑞实
姜广辉	郭齐勇	唐文明*	黄 勇	景海峰	黎红雷

目 录

易学传统

唐明邦：孔子与《周易》	(1)
徐仪明：《周易》心法简论	(10)
黎红雷：“位”与“德”之间 ——从《周易·解卦》看孔子“君子小人”说的纠结	(20)
余治平：《谦》卦与儒家谦德之养成	(33)
丁四新：出土《周易》材料与《周易》经学的哲学解释	(52)
常会营：孔子“晚而喜《易》”新论	(58)
宋立林：《孔子家语》与孔子易教思想	(69)
匡 钊：从“言意之辨”看《易》“象”的功能	(81)
孔德立：《周易》与孔子的“神道设教”思想	(91)
叶树勋：《周易·大象传》所见古代儒家的刑罚自然主义	(99)

宋明儒学

李存山：对宋学之开端的检讨	(112)
高海波：明代阳明学的分化	(136)
肖 平：情理与义理 ——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在理解孔子正名思想上的差异	(159)

刘 丰:礼学与理学的互动

——吕大临的《礼记解》与宋代理学的发展 (174)

钟治国:欧阳南野良知说析论 (203)

谷继明:王船山的气论与生死观 (224)

彭国翔:清康熙朝理学的异军

——彭定求的《儒门法语》初探 (239)

儒学散论

陈汉生:佛教传入前中国思想里的“情” (257)

葛荣晋:孝道与祭祖

——为香港 2012 年“祭祖对和谐社会的意义”祭祖论坛而作
..... (286)

郑 开:荀子人性论的理论预设:围绕“性伪之分”的讨论 (298)

蔡振丰:对反或连续:王弼与郭象思想的争议 (307)

李淑珍:全球化的我在哪里?

——儒家人格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(334)

余治平:“君为臣纲”与“从道不从君”

——儒家君臣一伦的公正性追求 (364)

韩 星:社会儒学

——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复兴之路 (386)

李可心:试论冯友兰四境界的秩序问题 (421)

杜维明等: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

——杜维明思想研讨会 (437)

叶树勋:简帛文献思想研究新范式的探索

——王中江教授《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》述评 (472)

辜鸿铭:斯文在兹

——辜鸿铭英译《论语》中译 (491)

孔子与《周易》

唐明邦

(武汉大学哲学院)

孔子为千古哲人,《周易》为千古奇书。二者关系如何?向来引人注目。《周易》是否作于孔子前?孔子是否读过《周易》?《易传》同孔子有何关系?此等问题,越到近代争论越多,言人人殊。近代争论,由古史辨派开其端,当时盛行的观点有:“孔子对于《易经》也并未有‘韦编三绝’的精深研究,那孔子作‘十翼’的话自然无根据了。”(《古史辨》第3册第90页)以往争论过的问题,到今天有一些已经统一认识,有一些将继续争论。今天,孔子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盛誉;《周易》已成为东西方学术研究的热门之一。将以往关于孔子与《周易》的关系的争论略加回顾,不是没有意义的。本节就孔子是否研究过《周易》、他对于以《周易》进行占卜有何见解、他引用过哪些《周易》思想教育弟子、他是否是《易传》的作者等问题,略抒管见。

一 孔子学《易》,韦编三绝

曾经有人否认司马迁关于孔子研读《周易》的记载,认为孔子时代未必有《周易》这本书,不然《论语》中为何没有提到它。

郭沫若认为,《周易》是战国时候才编纂成功的,说孔子曾经读到它,那是无稽之谈。

《周礼》明白地记载,西周时期,朝廷设有太卜,其职责是掌管用“三《易》”进行占卜的方法,三《易》指《连山》《归藏》和《周易》,可见《周易》早已存在。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二年(公元前672年)记载:

“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，陈侯使筮之。”这是《左传》关于《周易》的最早记载，它早于孔子诞生一百多年。说《周易》编纂于孔子之后，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。

认为《论语》没有提到过《周易》的人，首先是否认《论语·学而》中的这一记载：“子曰：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其根据是《鲁论》上“易”字作“亦”。一字之别，就把《史记》中关于孔子学《易》的记载全盘否定，这种对待思想史的方法是笔者不敢苟同的。司马迁去古未远，两代人任太史，具有参阅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的方便。他在《史记》中对孔子读《易》作了肯定记载，写道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。……读《易》韦编三绝，曰：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”《田敬仲完世家》也说：“孔子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，铁挝三折，漆书三灭。”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好称实录，言必有证，“韦编三绝”之说，绝非向壁虚构。《抱朴子内篇·祛惑》进一步铺张其说：“有古强者云，孔子尝劝我读《易》，云：‘此良书也。丘窃好之，韦编三绝，铁挝三折。’今乃大悟。”是所根据者，抑或古代文录，虽不足为凭，但亦不可置若罔闻。孔子作出“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”的论断，今天看来，并非夸大其词。《周易》卦爻辞包括了古代大量社会实践经验和生活经验，且以象数符号系统和语言文字系统紧密结合的方式写成，对于锻炼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特别有益，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著作，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是不易掌握其要旨的。孔子游说诸侯，欲以治国平天下，其生活经验丰富；晚年教育弟子，以《易》作为教材之一，故于此书的价值体会良深，作出这种概括，是十分中肯的，“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”，无疑是孔子学《易》的深刻体会。

二 孔子贬抑占《易》，独尊《易》理

无可讳言，《周易》确是古代三种占卜书之一。占卜在原始社会即已开始，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有占卜之书。《周易》是根据大量的古代占卜资料，加上丰富的自然知识、社会知识和民歌民谣、哲理格言综合编纂而成，它最初的用途只在占筮。古人重视它，亦在于此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保存了不少用《周易》进行占筮的资料，真实可信。以

《易》为占，当时遍于齐、鲁、秦、晋、陈、卫诸国，足见相当普遍。据记载，孔子也曾用《周易》占筮。在古代，科学文化不发达，决疑、预测手段不多，上自帝王，下及士大夫，常借《周易》占卜决疑，原是不可厚非的。它无非为决疑者更多地提供一种抉择的可能性，未可全以迷信视之。孔子时代，文化发达，科学进步，抉择的方式大有进步，以占《易》决疑、预测的方法已相形见绌，孔子加以贬抑，也是自然的。他说，（君子）“不占而已矣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反对再将《周易》用作占筮底本。他教弟子学《易》，不是教他们掌握如何占筮的方法，而是学习其中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理，用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和道德修养。

孔子主张君子学《易》而“不占”，在当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，表明孔子教《易》的目的，独在发挥其义理，尊重的是书中的社会政治经验与哲理格言。《周易》研究的这种方向，当然并非自孔子开始，《左传》之中已有六节资料，记载古人早已单纯引用《周易》思想作为评断是非、决疑预测的根据。《左传》宣公六年（公元前603年）王子伯廖引用《周易》丰卦的爻辞分析郑公子曼满必将遭祸。当时孔子尚未诞生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，晋国知庄子曾引用《周易》师卦爻辞说明彘子违反军纪，必定大祸临头。此外，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八年、昭公元年、昭公二十九年、昭公三十二年都记载有单纯引用《周易》思想分析问题而未事先用《周易》进行占卜的事实。

孔子重学《易》、不重占《易》的思想导向，对后代学《易》者大有影响。荀子继承孔子，主张“善为《易》者不占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。他们诱导后之学《易》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发展《易》理。故后之儒者所作“十翼”，多在政治思想和哲学上发展《周易》。战国时期，《周易》遂从占卜之书演变为哲学著作。再将《周易》视作占卜之书，渐为学者所不取。从这方面看，孔子对《周易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三 孔子引申《易》理启迪后学

孔子晚年从事教育活动，成为伟大的教育家，所用教材为“六艺”，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。《周易》可说是孔子利用的唯一哲学教材。

否认孔子学《易》、教《易》的人，主要论据是《论语》中没有孔子教《易》的内容。孔子时代，中国典籍绝不只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几种，肯定还有一些别的书，《论语》均未提到。孔子教学内容，礼乐之外，还有射、御、书、数，不能说这些方面全无教材。所用教材未必孔子自己编写。他主张“学而不作”，可见他往往利用原有教材。这些教材非孔子亲自编写、整理，其弟子也未必一一记录。《易》和《春秋》是孔子所重视的，都未见诸《论语》，不能说孔子同二书无关。

现存秦汉时期的文献，关于孔子引申《易》理教育弟子或同弟子讨论《易》理的记载不少，这些资料未必全属后人伪造。若是伪造，那时去古未远，学者极易识破，当有批评、厘正，不致流传至今。

我们不妨简述几节孔子讲《易》的事，究竟是真是伪，供读者鉴别。

(一) 提倡有恒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直接引用《周易》恒九三爻辞阐述有恒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南人有言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善乎！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这节爻辞，按其本意在提倡“恒其德”，即一个人要有坚定不移的道德操守。孔子虽然以此论述有恒的重要性，同时也强调“恒其德”的重要。在《论语》中，他就教人不可丧失节操。他说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“不可夺志”正是“恒其德”的恰当解释。

(二) 提倡谦恭。《韩诗外传》写道：“孔子曰：‘《易》先同人，后大有，承之以谦，不亦可乎？’”韩婴对孔子重谦的思想作了透彻的阐发，指出：“德行宽容而守之以恭者荣，土地广大而守之以俭者安，位尊禄重而守之以卑者贵，人众兵强而守之以畏者胜。”（《韩诗外传》卷八）这同孔子的弟子称赞他坚持“温良恭俭让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的为政原则是完全一致的。

(三) 注重损益转化之理。《淮南子》保留有一节史料：“孔子读《易》至损益，未尝不愤然而叹曰：益损者，其王者之事与？事或欲以利之，适足以害之；或欲害之，乃反以利之。利害之反，祸福之门户，不可不察也。”（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）同一思想资料亦见于《说苑》：“孔子读《易》，至于损益，则喟然而叹。子夏避席而问曰：夫子何为叹？孔子曰：夫自损者益，自益者缺。吾是以叹也。”（《说苑·敬慎》）“自损者益，自益者缺”、“欲以利之，适足以害之；或欲害之，乃反以利之”对损益转化之理讲得深刻、透彻。这同《荀子·宥坐》中论述孔子观欹器而发

表的“谦受益，满招损”的思想如出一辙。

损与益具有二重性，犹如坏事与好事具有二重性一样。坏事会带来损失，令人痛心，如能认真吸取教训，痛定思痛，避免重蹈覆辙，坏事就会变为好事；好事会促成事物发展，令人高兴，若被胜利冲昏头脑，失于检点，好事成为思想包袱，就会变为坏事。自损之人，头脑清醒，谦恭自抑，与人为善，会得道多助，实为自益；自益之人，把功劳归于自己，盛气凌人，人必敬而远之，岂不自损！孔子读《易》至损益，喟然而叹，义理良深。

《荀子》深明其义，申论道：“孔子曰：聪明圣知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让；勇力抚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谦，此所谓挹而损之道也。”（《荀子·宥坐》）孔子注重损益，提倡谦恭，同《易传》思想一脉相承。

（四）注重困亨之道。《周易》之困卦卦辞曰：“困，亨贞，大人吉，无咎。”遇困而三赞，一亨，二吉，三无咎，引人深思。孔子深通其理，作了透彻阐发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：“孔子遭难陈蔡之境，绝粮，弟子皆有饥色，孔子歌两柱之间。”子路不悦，批评孔子此时不当歌。孔子向他讲了困亨之道，“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，列士不困不成行”。他列举一些历史人物始遇困而终得亨的事例证明自己的观点。他说：“昔者汤困于吕，文王困于羑里，秦穆公困于崤，齐桓困于长勺，勾践困于会稽。……《易》曰：困，亨贞，大人吉，无咎。”（《说苑·杂言》）后来孟子阐发得更鲜明，指出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”遇暂时困难而丧失信心、自暴自弃、萎靡不振的人，不明困亨之理，是不会成就大业的。

四 孔子思想衍入“十翼”

司马迁最早肯定《易传》为孔子所作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明确记载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”十翼之中，只未列《序卦》《杂卦》二篇。《汉书》的作者明确论定，《周易》之作，“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”（《艺文志》）。三圣的具体所指尽管不同，

孔子为三圣之一是没有疑问的。疑问产生于宋以后。欧阳修《易童子问》最初怀疑《系辞》以下非孔子所作。明清以来,朴学家们考证十翼均非孔子所作,似成定论。但这一问题并不能以此作结。肯定十翼非一时一人所作则可,论定十翼与孔子毫不相干则未免过于简单化。匡亚明《孔子评传》认为,《易传》中不少思想与孔子思想“一脉相承”,《史记》谓孔子“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”这句话,“不能全信”,但也不是“凭空虚构”。这一看法颇为公允。

重读《论语》和《易传》,不难发现,孔子思想同《易传》思想,在不少问题上的确息息相通。略陈数例,以见一斑。

提倡封建纲常以巩固政治。孔子提倡巩固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社会等级秩序,以维护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;反对“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的纲纪败坏现象,抨击“陪臣执国命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的混乱政治局面。

《家人·象传》主张:“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而家道正,正家而天下定矣。”“家齐而后国治”也是《大学》的中心思想,出于孔子之门。显然,它同《易传》一样,都是对孔子思想的阐发。

孔子力图维护严格的封建等级制,强调尊卑上下有礼有序,主张以孝悌为本,使人民“不好犯上”,不致“作乱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,以巩固封建宗法等级制。《易传》同样主张“辨上下,定民志”(《象·履》)。“辨上下”之所以能“定民志”,正在于它维持贵贱、尊卑、君子、小人的社会等级秩序。

孔子倡导德治,坚持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。他说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更主张“仁者爱人”“泛爱众而亲民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,目的在于尽量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。孔子主张对人民要宽大为怀,反对“居上不宽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的统治作风。他认为治理社会,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在统治者对待人民的态度方面,《易传》提倡“容民畜众”(《象·师》),主张“哀多益寡,称物平施”(《象·谦》),对民众要持宽容态度,争取人民的信任;对财物要注意均等,不可过分剥削,造成财富不均。总之,要“节以制度,不伤财,不害民”(《象·节》),如此才能上下相安,否则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”(《象·否》),结局将是危险的。

提倡“神道设教”以安定人心。孔子是忧国忧民的思想家。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危机面前，他极力主张通过“神道设教”以安定人心。

孔子主张“畏天命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认为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崇奉祖先神，“慎终追远”，以求“民德归厚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他说：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”“礼与其奢也宁俭，丧与其易也宁戚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这些思想都是力图贯彻“神道设教”精神，假天神之力以安定民心，从而安定社会。

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，《易传》认为“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”（《象·观》），王者当“作乐崇德”，“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”（《象·豫》）。《易传》与孔子不同，并不是提倡消极地“畏天命”，而是要求人们积极地发挥主体能动作用，“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”（《象·大有》），其目的十分明确，即认为只有如此，统治阶级才能“出可以守宗庙社稷，以为祭主”（《象·震》），掌握统治社稷的权力。

强调个人道德修养。对于个人思想道德修养，孔子一贯十分注重，《论语》中这方面内容所占篇幅最多。孔子认为，做人要做正派君子，一言一行要为社会树立榜样；治理社会必须教化“小人”，圣人的思想品德是教化“小人”的典范，君子就是“敬德修业”的典型人物。

孔子主张君子必须自强自重，奋发进取。他自己以身作则，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他主张思想修养必须坚持不懈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时刻反省自励。曾子概述孔子思想修养准则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《易传》主张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（《象·乾》），强调“进德修业，忠信所以敬德也，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”（《文言·乾》）。这些主张同孔子的观点何等相似。

孔子反对非礼之举，一言一行要符合封建政治准则。他说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“见其过而内自讼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“过则勿惮改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“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焉，过也人皆见人，更也人皆仰之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《易传》同样主张“君子以非礼弗履”（《象·大壮》），要求做到“见善则迁，知过则改”（《象·益》）。

孔子认为做人的最高准则是“仁”。他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个人修养的根本原则是“克己复礼

为仁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孔子说:“唯仁者能好人,能恶人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又说: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《易传》发展孔子这一思想,既强调仁,又强调义,认为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(《说卦》),主张效法先王,“正位凝命”(《象·鼎》),时刻“恐惧修省”(《象·鼎》),检点自己的言行,以防有违仁义之道,“敬德修业”要像孔子所说的那样,时刻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,不可疏忽大意,有半点苟且之心。

孔子认为无论处于治世还是处于乱世,都要保持节操。这是对个人修养的最大考验。他主张:“邦有道则仕,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又说:“邦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邦有道,贫且贱焉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耻也。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这就是说,政治开明之时,就当努力工作,建功立业;政治昏暗之时,就应及早退避,不可同流合污。这一思想在《易传》中也有充分体现。《易传》主张君子“独立不惧,遁世无闷”(《象·大过》)。若居否塞之世,“君子以俭德避难,不可荣以禄”(《象·否》)。否塞之世而享有荣禄者,难保不同流合污,玷辱名节。

五 结束语

不难看出,《易传》十篇虽未必出于孔子手笔,其中显然渗透着孔子及其后学者的儒家思想,这是不可否认的。司马迁《孔子世家》肯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”,绝非无稽之谈。

经过战国时期一批儒者对《周易》的诠释,周易的性质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,由占筮之书演化为政治哲学理论著作,后来列为“五经之首”,俨然成为儒学正宗。实际上,《周易》古经乃中国古代巫史文化的遗存,同道家思想更加接近。后来道家发展其阴阳八卦思想,利用象数思维模式,在古代科学技术上做出的成绩比儒家更突出。儒家利用《周易》思想资料,主要是发展其政治伦理思想,使之成为政治伦理经典。

孔子对《周易》思想的发展,贡献是伟大的。他力图使《周易》摆脱占卜神学思想的束缚而独立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著作,开辟了以后数

千年《易》学研究的新方向。《周易》无可否认是儒学思想渊源之一。

今天研究孔子，不可不研究《周易》；研究《周易》更有利于认识孔子思想的影响。孔子所代表的儒学，《周易》所代表的《易》学，既有同中之异，又存在异中之同，二者结合，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流，不可割裂，也不能割裂。加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，必然推动《周易》思想研究的深入。这就可以看出，海外学人对新儒学推崇备至，同时《周易》研究的热潮也随之兴起，二者绝非偶然巧合。许多人把《周易》思想看作代表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不过，将《周易》思想纯粹归结为儒家思想，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不大符合历史实际的。《周易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主要作用，在于它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家提供了一套易学象数思维模式，自然哲学是其主要内容之一，与儒学大异。它导致古代科学家们在探讨宇宙和人身秘密的过程中，掌握了一种与儒学不同的思维方法，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们打开科学之门的一把“金钥匙”，中国古代科学家们正是充分利用了《周易》所提供的“宇宙代数学”，从而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。由于孔子“不语怪力乱神”，把探讨宇宙和人身奥秘的科学技术斥为“鄙事”，将有志于学稼、学圃的学生斥为“小人”，影响所及，不利于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同时也不利于《周易》思想的发展。探讨孔子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更有利于对儒学和《易》学的社会历史价值作出全面的、公允的评价。

《周易》心法简论

徐仪明

(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)

在中国思想史上，孔门的心法被视为“中庸”；而“精一执中”则被看做尧、舜、禹相授之心法。其实，这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，即“中”“中道”“中庸”“执中”。那么，在《周易》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中，能够用来相互授受的重要心得和方法又是什么呢？是否也是“中”或“时中”“正中”“中道”“中行”等呢？不能说“中”不是《周易》的重要观点之一，然而“心法”讲究的是以“心”传“心”，从“道心”“人心”之论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和蔡沈等人的良苦用心，因此不能认为“中”是《周易》之心法所在。显然，“心法”强调“心”的地位和作用，看来有必要从《周易》有关“心”的论述来加以探讨。只有通过研究《周易》的情感之心^①，特别是围绕着忧悲惊惧等情感活动的论述来理解“心惻”这一核心观念，方能够深入认识这一问题。

一

如果从字源上来看，心字至少在甲古文和金文中已经出现，其不仅指心脏器官，而且具有人的内心思维活动、精神意识以及道德观念等多重含义。在《易经》中，“心”字的思维和意识含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深化。通观卦辞和爻辞“心”^②字凡七处，分别见存于《坎》（“维心”）、

① 张立文：《心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

② 张立文的《心》有“《易经》心为心理”一节，指出其中《易经》之心多描述感情心理。请参见张立文《心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26—27页。

《明夷》（“明夷之心”）《益》（“立心”）、《井》（“心恻”）、《艮》（“熏心”、“其心”）《旅》（“我心”）六卦之中。其中《井》卦九三爻辞有“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”一语值得特别注意。《说文》：“恻，痛也。从心，则声。”《广韵》“恻，愴也。”按照一般性的解释，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：井修治好了，却不被使用，使我感到悲痛。心恻，即悲伤、悲痛之意。然而，如果我们结合《周易》经、传全文以及后世一些著名解《易》的篇章来加以释读的话，就会发现“心恻”二字有着多种深刻的含义，也可以认为其就是《周易》的心法。

首先，后世诠释者对“心恻”的理解大致如下：

程颐《易传》：“恻，恻怛。”“怛”的意思，《释文》曰：“怛，惊怛也。”《广韵》曰：“悲惨也。”《增韵》：“惊也，惧也。”可见心恻具有惊恐忧惧之意。

《周易集解》引干宝语：“恻，伤悼也。”朱骏声《六十四卦经解》有“坎为加忧，故恻”之语，其又申论之：“坎为心，二折坎心，故恻。”强调了心恻“为加忧，为心病”“为伤悼”，突出了忧伤的含义。

应该说以上的解释并非没有根据，参之以《周易》经传内容就能够明白。在《易经》中喜、悦之类的情感描述不多，而对忧、惧、悲、惊、悔、不快等较为沉重的情感因素认识得相当深刻。下面作一简单论述，如《乾》卦九三爻辞说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”李镜池《周易通义》曰：“乾乾：闻一多谓当读为悁悁。悁，忧貌。”再如《小畜》卦六四爻辞谓：“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。”李镜池释曰：“血：借为恤，忧患。”另如《涣》卦上九爻辞：“涣其血去逖出，无咎。”李镜池谓：“血去逖出：同于《小畜·六四》‘血去惕出’，血借为恤”，同样解释为忧患、忧虑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忧患、忧虑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好的即“无咎”。《易经》还直接提到“忧”字：《丰》卦卦辞：“亨，王假之，勿忧，宜日中。”《临》卦六三爻辞：“甘临，无攸利。即忧之，无咎。”《易经》中也提及“愁”，如《晋》卦六二爻辞：“晋如愁如，贞吉。”同样，“忧”、“愁”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好的“无咎”“贞吉”。《易经》中忧患意识是相当深沉和凝重的，无怪乎《易传·系辞下》说：“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忧患作为一种情感已经弥散和渗透到作易者的整个思想意识之中了。宋人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说：“《乾》《坤》二卦之下，继之以《屯》《蒙》《需》《讼》《师》《比》，六者皆有坎，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